

# 鲁迅与克尔恺郭尔

## ——紊乱的声调

### 一 克尔恺郭尔与女性

她轻轻一吹，结果呢，母音符号消失了。因为那奇妙的点只是鼻烟的颗粒罢了。学者大喜，奔向饭桌。他欣悦于母音符号消失了，但更欣悦于他的妻子。  
(索伦·克尔恺郭尔<sup>1</sup>)

这里讲的是一位住在荷兰的东方学学者的故事。妻子奇怪已经中午了丈夫还不来吃饭，到房间来找时，她的东方学学者丈夫正盯着书，为从未见过东方语言的母音符号而意驰神摇。在精神亢奋的丈夫面前，妻子轻轻吹气=发出声音，占据丈夫注意力的母音符号就消失了。

克尔恺郭尔接着得出这样的结论：

因而可以说她的生命比男性的生命更幸福，原因在于有限性的确可以让人幸福，而无限性则决不可能如此。她比男性更完全。因为说明什么东西的人比探求说明的人更完全。……这样一来，女性由于解明有限性，所以是男性最深奥的生命，而且是应该被掩藏被隐蔽的生命，正如有根之生命通常所是的那样。看吧，所以我憎恶诸如女性解放之类的一切可厌言论<sup>2</sup>。

1. 索伦·克尔恺郭尔《非此即彼》第2部《人格形成之均衡》，《克尔恺郭尔著作全集》第2卷，424-425页。  
2. 同上，427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让男性放弃想成为自然之主、指导者的要求，将这一地位让予女性吧。女性是自然的女主人，自然理解她们，她们也理解自然。自然遵从她们眼神的暗示。她们因赠予男性有限性而成为他们的全部，没有她们，男性就是摇摆不定的灵魂，就是没有宁静祥和的安居之所的不幸之人<sup>3</sup>。

更加完全的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女性才是幸福的。但是，倘若如此，那么女性为什么要特意地去关心男性，与男性搭话呢。克尔恺郭尔将之归因于女性的“本质”。“因为他者而祈祷在本质上是适合女性的”<sup>4</sup>。亦即是说，对克尔恺郭尔而言，女性是作为有限性的存在，她们“break（中断）”男性这一面向无限的精神或实存，并藉此使男性得以完成<sup>5</sup>。

## 二 女性、植物、语言——自然的精神或大地的精神

这种女性形象在《勾引者日记》中也一以贯之。在该书中，克尔恺郭尔将作为范畴的女性定义为“为他者的存在”<sup>6</sup>之后，这样说道：

这一规定〔为他者的存在〕同时适用于自然全体以及所有女性化之物。自然全体是一心为他者而存在的，不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比如自然的各个部分为其他的各个部分而存在，而是自然全体为他者——为精神而存在。各个事物亦如是。譬如说，植物的生命天真烂漫地夸耀其蕴含的魅力，且仅为他者而存在。同样，字谜、动作游戏、秘密、母音等都

3. 同上，429页。

4. 同上，431页。

5. 索妮亚·西卡根据这则故事认为，克尔恺郭尔视女性为“break”（中断、休憩），亦即是说，“中断那赋予男性化的实存以特征的、迈向完成的艰难而永无止境的冲动，使之休息”。（Sonia Sikka, “The Delightful Other: Portraits of the Feminine in Kierkegaard, Nietzsche, and Levinas,” in Tina Chanter [edited],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Emmanuel Levinas*, p. 98.）男性“一方面被女性拴在有限性之中，另一方面又是自己向往无限的实存”，所以能够进行“有限与无限的综合”，获得“精神性成熟这一理想”。（ibid, p. 99.）而女性由于仅与有限性相关联，所以从一开始就是满足于自身状态的幸福的存在。

关于克尔恺郭尔如何定位女性在精神阶段上的位置，请参阅森田美芽《キェルケゴールと女性論》（《克尔恺郭尔与女性论》），收入《キェルケゴールを学ぶ人のために》（《给学习克尔恺郭尔的人》），尤其是292-297页。

6. 克尔恺郭尔《非此即彼》第1部《勾引者日记》，《克尔恺郭尔著作全集》第1卷，603页。

完全是为他者而存在的<sup>7</sup>。

请注意他将女性、植物、语言（母音）三者作为“为他者的存在”的例证。克尔恺郭尔将女性表象为植物时，印象最为鲜明的隐喻是“花”。作为“花”的女性，用“花蔓”即那浓密的秀发“将男性绑缚在地上”<sup>8</sup>。

这一女性的存在（实存一词太过沉重，因为女性不是从自身出发而存在的），用娴静来表达是恰如其分的。这一表现让人联想起植物性的生，正如诗人们经常说的那样，女性是花，在她们身上，即使精神性的东西也以植物性的方式显现出来<sup>9</sup>。

女性不是实存，而是存在。然而即使不是像男性那样的实存，女性也还在某种方式上是“精神的”。那是自然的精神、大地的精神。

这种女性的精神，说着与属于男性精神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引文中列举出“字谜”、“动作游戏”、“秘密”以及“母音”，但那终极的语言是教会信徒们祈祷的语言，是先于男性语言而发的本源性地语言<sup>10</sup>。在克尔恺郭尔看来，实存的男性精神作为精神之所以成为可能，正缘自女性那温柔的祈祷的声音，那扎根于大地之上的花的女性。

### 三 中国的现代性与女性的声音——鲁迅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鲁迅<sup>11</sup>）

7. 同上，604页。

8. 克尔恺郭尔《人格形成之均衡》，《克尔恺郭尔著作全集》第2卷，429页。

9. 克尔恺郭尔《勾引者日记》，《克尔恺郭尔著作全集》第1卷，604页。

10. 克尔恺郭尔《人格形成之均衡》，《克尔恺郭尔著作全集》第2卷，429-432页。

11. 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321页 / 《鲁迅全集》第1卷，学习研究社，401-402页。

但是克尔恺郭尔式的图式不适用于中国，至少不适用于中国式的现代性。在那里找不到支持男性精神的女性的声音。

让我们从鲁迅入手。读过克尔恺郭尔的鲁迅也是关注声音的现代主义者。鲁迅直面的是“无声的中国”<sup>12</sup>，是“沉默的国民”。怎样才能将声音归还给中国人，哪怕呢喃或者嗫嚅也罢，怎么才能让人发出“真声音”来呢。那不是教导人们“汝为国民”、“汝为世界人”的启蒙。那样的声音只不过是把所有差异都同一化的“恶声”<sup>13</sup>。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sup>14</sup>。这句话的背景，是这些“沉默的国民”互相咬噬灵魂而无法容忍的现实。只要想起咬阿Q灵魂的是长着“狼眼睛”的众人就够了。正因为被他们咬噬，所以阿Q在“他的话被咀嚼”，以至被杀，都没能喊出“救命”<sup>15</sup>。

那么，怎样才能同时拯救阿Q和咬噬阿Q的人们呢？让我们来看看鲁迅为《呐喊》（1923年）一书写的《自序》：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sup>16</sup>。

“愚弱的国民”的象征，就是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看到的日俄战争的幻灯中的中国人。学习治病救人的医学的场所化成了嘲笑被捆绑着残酷杀害的中国人的空间那一瞬，正好是“相同者”的共同体暴露出其暴力的时刻。在那里的日本人决不会听见，而且也决不想听见幻灯里的中国人的声音。

12. “人是有，没有声音”（《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12页 / 《鲁迅全集》第5卷，207页。鲁迅直面的，是文致使声音受损到无法恢复程度的状况。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鲁迅说：“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同上，15页 / 同上，210页）。他认为恢复声音的办法在于口语文，但那是极其困难的，就象是“奇迹”（同上，13页 / 同上，207页）。

13.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26页 / 《鲁迅全集》第10卷，54-56页。

14. 鲁迅《俄译〈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七卷，82页 / 《鲁迅全集》第9卷，114页。

15.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一卷，526页 / 竹内好个人译《鲁迅文集》第1卷，153页。

16. 鲁迅《呐喊·自序》，同上，4-7页 / 同上，5-6页。

其后鲁迅弃医学文，那是为了要先救治“愚弱的国民”。为了归还声音，鲁迅试图发明“文艺”。

#### 四 打鬼的速朽之文

然而直到鲁迅的时代，在中国，正是“文”一直剥夺了人们的声音。不就是它产生出“鬼（亡灵）”来的吗？如何一边对抗文，一边书写新的文呢？面对这一困难，鲁迅选择的是“速朽”的文。《阿Q正传》的开篇这样说：

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sup>17</sup>。

书写阿Q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这件事，原本就是“思想里有鬼似的”的毫无道理的事。阿Q是无名的亡灵般的人物，为他作传，不朽之文（古文）不合适，速朽之文（白话文）才合适。

《野草》（1927年）的《题辞》中也重申了“速朽”。“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sup>18</sup>。“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的“野草”这一文学将“腐朽”，进而被“地火”“烧尽”，鲁迅称之为“大欢喜”，加以充分肯定。那是要把鬼封进自己写的文章中，令其速朽，由此而与自己一起打鬼。

鲁迅这一笔名的字义就是“迟缓、迅速”。关注速度的问题，不是吁求跨越现实的彼岸，而是驻足于现实内部，解读那复杂的脉络，并逆流而上。那里没有能够打鬼和救济灵魂的超越性高度，也可以说是没有纯粹的声音。正因为此，鲁迅还是发出了无声的呐喊。那也就是说，理想的文不存在。既然如此，尽管文将生出鬼，要打鬼也只能诉诸文。

17. 鲁迅《阿Q正传》，同上，487页/同上，98页。

18. 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二卷，160页/竹内好个人译《鲁迅文集》第2卷，4页。

## 五 鲁迅与女性的声音

不过此处没有克尔恺郭尔设定的那种女性的声音。有必要慎重考察鲁迅作品中出现的声音的性别。不能忘记,《狂人日记》(1918年)卒章那句“救救孩子……”未必是男性的声音,或者说包含着从男性声音转化为女性声音的可能<sup>19</sup>。然而,即使做出这种保留,仍然很难从鲁迅作品中找出“中断”男性精神的女性声音。

这恐怕与女性问题对鲁迅而言是重大挫折不无关系。中岛长文指出了“鲁迅之情欲的舍象与缺失”<sup>20</sup>,并认为与朱安的婚姻要算重要理由。这段婚姻是鲁迅母亲做主的婚姻,而非鲁迅自己的选择。然而,鲁迅出于对母亲的孝顺,没有拒绝这个婚姻。但是,青年鲁迅的思想核心是以个体自由和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婚姻问题上的现实与理想之乖离咬噬着他的精神,并刻下了伤痕。

为了逃避这一现实[与朱安的婚姻],他回到了东京。那也许是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的本能忌避。一段时间内他漠视这一问题,继续开展文艺运动。但是其文艺运动的根本是个性、自由、精神,他思考的问题直接与自己的生存方式相关。连自己一身都不能自主地安排,有什么资格向别人标榜个人主义呢,或者即使标榜,又能如何呢?在他写文章时,这种自觉肯定时刻都会涌起。而给他以最后的决定性一击的,还是野之人的文章<sup>21</sup>。

鲁迅的现代主义像破裂的镜子似的显现出两个自己。一个是自由独立的现代的自我,另一个则是母亲的孝子和作为家长的鲁迅形象。为了弥缝这一裂痕,只有从意识里隔绝朱安。然而越是隔绝,鲁迅就越无法接受自己的状态。中岛长文认为给予鲁迅决定性一击的是野之人,即高山樗牛的弟弟斋藤信策

19. 有关《狂人日记》中声音的女性性问题,请参中岛隆博《残響の中国哲学——言語と政治》(《回声的中国哲学——语言与政治》)第10章《速朽与衰老》,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

20. 中岛长文《泉之声——鲁迅的近代》,69页。

21. 同上,52-53页。

(野之人)<sup>22</sup>。野之人这样谈论克尔恺郭尔：

克尔恺郭尔与易卜生在思想上尤其有共鸣，他也说：“正直与公明是结婚的首要条件。没有这一点，就是丑陋的、不道德的。”又认为：“结婚最大的危险就是结婚者丧失自由”<sup>23</sup>。

当时（留学日本时期，1902-09年），鲁迅在野之人的影响下这样谈论克尔恺郭尔：

至丹麦哲人契开迦尔（S. Kierkegaard）则愤发疾呼，谓唯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sup>24</sup>。

尽管理应是“顾瞻他事，胥无益焉”，但鲁迅并没能那样做。勿宁说，为“丑陋的、不道德的”所束缚，自己的个性、朱安的个性都未能发挥。其后，鲁迅的作品中心几乎没有再出现女性的声音，这和鲁迅几乎没有谈到克尔恺郭尔正好一致<sup>25</sup>。

当然，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结构性地纠缠于中国式现代性的问题。鬼缠绕着觉醒的精神，将之绑缚在古老的大地上。鬼不是支持男性精神，而是付着其上，将之咬破。那么，该怎么办呢？鲁迅叫道：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帐勾消的时候。

22. 关于鲁迅受到野之人的深刻影响的问题，请参阅以下论文：伊藤虎丸、松永正义《明治三〇年代文学と鲁迅》（《明治三十年代文学と鲁迅》），《日本文学》29号，1980年；伊藤虎丸《鲁迅と日本人——アジアの近代と〈個〉の思想》（《鲁迅と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朝日新闻社，1983年；清水贤一郎《国家と詩人——鲁迅と明治のイブセン》（《国家与诗人——鲁迅与明治的易卜生》），《东洋文化》74号，1994年；陈玲玲《留学期の鲁迅におけるイブセンの受容》（《留学期鲁迅对易卜生的吸纳》），《多元文化》5号，2005年。
23. 斋藤野之人《易卜生其人》，收入《东亚之光》，1906年，〔《明治文学全集40》〕，筑摩书房，1970年，134页。
24. 鲁迅《文化偏至论》（1907年），《鲁迅全集》第一卷，51页 / 《鲁迅全集》第1卷，77页。
25. 鲁迅比较完整地谈论克尔恺郭尔的是《帮闲法发隐》（1933年），但该文也是一篇要设法绕开克尔恺郭尔的文章。不过从鲁迅的日记可以得知，1935年末他购入了《克尔恺郭尔选集》三卷，那么他应该并非不再关注克尔恺郭尔。鲁迅始终是矛盾地看待通过女性的声音而确立男性精神的克尔恺郭尔式实存的。

旧帐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sup>26</sup>

“救救孩子……”在这里又出现了<sup>27</sup>。鲁迅把希望寄托于孩子而不是女性的声音之上。而孩子的声音只有在紊乱的声调中才能够听取。

#### 参考文献

竹内好个人译《鲁迅文集》全6卷，筑摩书房，1976-1978年，新装版1983年。

鲁迅《鲁迅全集》全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鲁迅《鲁迅全集》全20卷，学习研究社，1984-1986年。

セーレン・キェルケゴール《キェルケゴール著作全集》（索伦·克尔恺郭尔《克尔恺郭尔著作全集》）第1卷，创言社，1994年。

セーレン・キェルケゴール《キェルケゴール著作全集》（索伦·克尔恺郭尔《克尔恺郭尔著作全集》）第2卷，创言社，1995年。

中岛长文《ふくろうの声 鲁迅の近代》（《枭之声 鲁迅的近代》），平凡社，2001年。

Sonia Sikka, “The Delightful Other: Portraits of the Feminine in Kierkegaard, Nietzsche, and Levinas,” in Tina Chanter (edited),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Emmanuel Levinas*,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6. 鲁迅《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一卷，323页 / 《鲁迅全集》第1卷，403页。

27. 《鲁迅全集》第一卷，423页 / 竹内好个人译《鲁迅文集》第1卷，28页。这是竹内好第二次的译文（第一次的译文译作“こどもを救え……”，竹内好译《鲁迅选集》第1卷，岩波书店，1956年，27页）。竹内在翻译《狂人日记》时，把中文第一人称的“我”都译为“おれ”，但唯有最后的一句看起来是用女性的声音译的。恰如鲁迅指出，只有在世界的“末日”“抱住”应该到来的未来的孩子一样。[由于日文中男性与女性的用语有所不同，故此处所引用的竹内好的第二次译文为“せめて子どもを……”，可以理解为女性的口吻，而“こどもを救え……”则是男性的。另外，“おれ”是男性第一人称。——译注]